

在民族復興史裏 讀懂中共黨史

——讀劉統新作《火種》有感

谷中風



▲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外景。新華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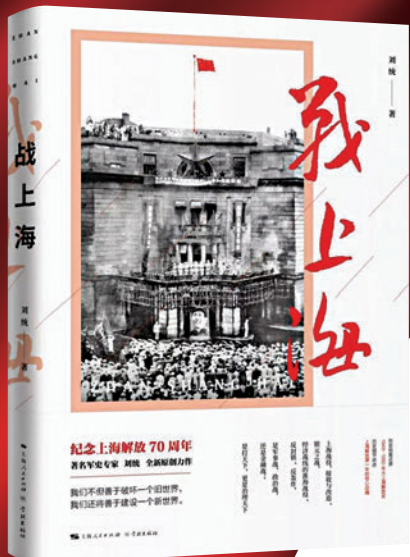


◀劉統著《火種：尋找中國復興之路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。從去年開始，中共黨史題材的讀物 and 文藝作品陸續湧現，其中不乏有新意、有看頭的佳作。獲得「2020年度中國好書」稱號的《火種：尋找中國復興之路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

▲劉統致力於黨史讀物寫作，其著作《戰上海》記錄了共產黨人解放上海的英勇經歷。

評書講黨史 親切又生動

話說黨史

《話說黨史》是遼寧省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、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田連元新創作的百集現代音頻評書。作品精選中國共產黨歷史上100個經典故事，以評書藝術的方式，栩栩如生的語言生動講述黨史故事，再現歷史偉人的音容笑貌。

《話說黨史》是田連元十分看重的作品。為這部作品，田連元精益求精，手寫書稿，三天一集。寫好後，田連元的外孫女和徒弟幫他將手稿打成電子版，經檢查、審校、再檢查才算定稿。每完成10集，田連元就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錄音，「以前錄評書我一天能錄三四集，《話說黨史》一天只能錄兩集。因為我的歲數大了，錄多了眼睛不好使。」

田連元接受採訪時曾表示：「曲藝藝術是最輕便的藝術，是投槍、匕首，我想用一種最輕便的藝術去處理重大嚴肅的歷史題材。」



▶評書名將田連元生動講述黨史故事。

《火種：尋找中國復興之路》作者劉統，是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教授，也是中共黨史和軍事史專家。近年來，他致力於黨史讀物寫作，力作連連，《北上》《戰上海》等都廣受好評。作為從古代史轉入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者，劉統極為重視史料的挖掘和解釋，善於以小見大，從細節入手還原歷史圖景。因此，他筆下的歷史，現場感極強，讀之如見其人、如聞其聲。他又善於在長時段中考量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，引導讀者進入歷史的深處。這也是《火種》一書的特色。

一個「尋路」的過程

全書從引子「開天闢地的大事變」寫起，至結語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」而止。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一望而知，書的主體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早期歷史。劉統在書的結尾處說：「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，點燃了一個火種。」這本500多頁的書共分24章，絕大部分內容屬於中共黨史的範疇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」這一歷史事件，在書的第10章才得到正面敘述。而此前的9章，都在為這樁「開天闢地的大事變」做鋪墊。

這個長長的鋪墊是從1901年《辛丑條約》的簽訂開始的。劉統從那個中國人最恥辱的時刻寫起，歷數廢除科舉、立憲鬧劇、革命風潮、辛亥革命、袁氏竊國、五四運動等眾多歷史事件。隨着民族災難的深重和民眾思想的覺醒，歷史的鼓點也越敲越緊，直至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之成立。接下來，本書轉而敘述中共早期的組織建設和工人運動，國共從合作到分裂，南昌起義、秋收起義、廣州起義，井岡山鬥爭，直至古田會議，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。

從中我們可以讀到貫穿全書的是一種深遠的歷史眼光。哲人有云：看歷史，要離開一些距離，才能看得清楚。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的土地上誕生的，孕育她的母體乃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。黨史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，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史的一部分，因而也必須在此宏大視野中才能獲得正解。對此，劉統有充分的自覺。他在書中這樣描述，「中國共產黨不是憑空產生的，這是一個「尋路」的過程。」所謂「尋路」，尋的就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路。

在這個意義上看中共黨史，就不是個別人行動的集合，而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反抗民族壓迫、追求獨立自由的奮鬥史中的一環。這是大勢所趨的一環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。其實，這也是近年來中共黨史書寫的新氣象。以近期的文藝作品而論，評書名將田連元在今年錄製了評書《話說黨史》，用講故事的方法，講述中共的歷史，繪聲繪形，通俗易懂，引起網友的追捧。我注意到，這部名為「黨史」的評書是從三皇五帝說起的，秦皇漢武、唐宗宋祖，直至講到近代中華民族由盛而衰的「痛史」。前段時間的熱播劇《覺醒年代》開篇也是描寫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的踴躍，以及人們思想的壓抑和苦悶，繼而深描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壯烈，刻畫陳獨秀、李大釗等革命先驅之偉岸，最後收束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。這部被譽為「零差评」的電視劇，在審美多元的今天得到了觀眾一致好評，我想，是與「長時段」的歷史關照分不開的。

今日之中國，已處於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，對於民族復興的目標，國人信心堅定。而在向此目標邁進的進程中，閃耀的是中國共產黨播下的火種，迴盪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鏗鏘足音。閱讀《火種》，讓我們更深切地認識到

這一點。

尊重歷史原貌

《火種》是一本中共黨史讀物，而非專門的學術著作。但是，《火種》對史料的掌握和辨析，以及通達的史觀，絲毫不亞於史學專著。建黨先驅的文章、日記，共產國際檔案和租界檔案，以及黨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，都被劉統吸收進書中，力求以史料的排比還原歷史的現場。

舉例而言，在引述毛澤東的文章時，劉統考慮到《毛澤東選集》中有些文章經過編輯處理，為反映歷史原貌，在寫井岡山這段歷史時，他特



▲「南陳北李·相約建黨」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佳話，陳獨秀(左)、李大釗的塑像如今在中共一大紀念館陳列。大公報記者張帆攝



▲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展示的李達、王會悟夫婦的照片。新華社



▲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起義軍在胸前佩戴了紅領帶，用以區分敵我。

意從日本學者竹內實編輯的《毛澤東集》中引用文獻，以更生動地表現革命道路在探索逐漸成熟的過程。又如，寫到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內部矛盾時，劉統引用了周恩來《關於「六大」的研究》中關於吳稚暉罵汪精衛的文字，並特意說明：引文來自「延安馬列學院中共黨史學習教學研究室打印本」，因為該文收錄進《周恩來選集》時文字有所修飾。凡此種種，都體現了尊重歷史原貌的態度。

這種態度還體現在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。本書開篇就用了相當多的筆墨介紹確定中共誕生紀念日的曲折過程。1941年中共成立二十周年時，延安決定舉行紀念活動。然而，作為當事人的毛澤東和董必武，卻都記不太清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了。直到1978年，才有學者多方查找史料，落實一大召開時間為7月23日。

胡喬木在《中國共產黨歷史》第一卷中寫到，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，「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，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但是，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起來了」。劉統在《火種》中則對此作了更富有歷史感的論述：「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，點燃了一個火種。這些年輕的建黨人，當時也沒意識到自己辦了多大的事。他們中一些是小資產階級出身，熱情、衝動、意氣用事。陳公博在中共一大沒開完就跑了，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的歷史記錄。李達、李漢俊是做學問的人，合則留不合則去。陳獨秀的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，是開風氣者，卻又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軌道。……那些為此奮鬥過的先驅，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和敬仰。儘管有些人中途轉變了、墮落了、背叛了，走向了歷史的反面，但是我們依然應該肯定他們曾經作出的貢獻，因為這都是歷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。」我以為，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，科學而親切。

語言生動文史交融

於是相應的，《火種》不諱言黨在不成熟時期犯過的錯誤，並對此進行反思。比如，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，槍斃土豪劣紳成為一時風潮。在湖南，號稱大儒的葉德輝被槍決於長沙識字嶺。「葉德輝固然是反對革命，但他沒有像其他土豪一樣，有武力攻擊農會之類的行為」。葉氏之死，引起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恐慌。劉統敘完這一歷史片段後，專門從黨史學家養育之的一篇文章中轉引了毛澤東的反思：「對於這種大知識分子不宜於殺。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，我看是不那麼妥當的」。同樣，第13章「南昌起義第一槍」，在充分說明南昌起義重要意義的同時，又多處引用朱德、陳毅、聶榮臻等人的回憶，分析這場起義的歷史局限，總結歷史教訓。如此寫法，歷史就不是「名詞解釋」的結合，也不是既定結論的鋪陳，而變得豐潤厚實，給人以思想啟迪。

語言的生動也是《火種》值得稱道的地方。比如，講到中共一大前各地共產黨組織之間互相聯絡的情況時，劉統談諧地以「朋友圈」作比喻，說明有師生、同鄉、同事之誼的早期組織比較容易建立聯繫。而湖北的利群書社，雖很早就開始革命工作，「但因為沒有朋友圈的關係，與中共一大失之交臂」。活潑的文風讓嚴肅的歷史變得更有可讀性，也與當下的文化風尚有了更緊密的聯繫。

詩史一體、文史交融，本也是中國史家的傳統。《火種》讓我們看到這一傳統在新的歷史內容上的展現。遺憾的是，本書目前只到1930年代，我們期待著「續集」的誕生。